

# 晚清沿海口岸城市 中西官紳聯動與變法話語呈現

——基於格致書院及其課藝的分析

熊月之

**【提要】** 中西聯手辦學與共同管理，使得上海格致書院兼具中西特點，考課策論為中國特色，課藝內容則具全球視野。南北洋大臣、口岸城市官員與知識分子各展所長、聯手互動的運作方式，為書院課藝開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有力的經濟支撐與充沛的人才保證。口岸官員將採西學、造鐵路、辦銀行、改科舉、通民情等諸多現實問題，提到學生面前，讓他們不得不認真思考、切實面對，從而將他們從傳統的科舉桎梏中解放出來，投身到救亡圖存的行列中。西學與洋務成為課藝的兩大主題。有獎徵文的方式，新式媒體報刊的介入，使得書院成為沒有圍牆的學校，考課成為不定生員的課堂，使得變法思想的產生與呈現，由先前思想家個人自發思考、孤獨生產、零星呈現，變成有共同傾向的思想者群體的自覺思考、共同生產與集中呈現。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格致書院課藝在晚清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關鍵詞】** 晚清 口岸城市 官紳 變法話語 格致書院

**【中圖分類號】** K25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1 - 0005 - 20

同光時期，即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至甲午戰爭以前，有三股力量同時推動著變法思潮的發展，即條約口岸知識分子<sup>①</sup>、開明官員，與來華西人中的醒華派。<sup>②</sup>這三股力量起初是各自發聲，各發其聲，互不聯通或較少聯通，到了 19 世紀 70 年代以後，隨著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等近代企業的創辦，《申報》等新式傳媒的出現，口岸知識分子的集聚；隨著中國對外開放腳步的挪開，中國皇帝開始接見外國公使，中國開始向歐洲、美洲及亞洲各國派遣出使大臣，向歐美派遣留學生，口岸城市中國官員開明化趨向日益顯著；隨著包括傳教士在內的來華西人與中國官紳接觸日益廣泛，這三股力量之間互通聲氣、互相支持的現象日益頻繁，乃至出現三股力量協力辦學、共同建構變法話語的奇觀。上海格致書院的創辦，格致書院課藝的產生，就是這一奇觀的具體呈現。集中體現變法話語的《格致書院課藝》的出版與傳播，則是這三股力量成

功地將變法思想、行政權力、新式傳媒有機結合的成功範例。

## 一、中西聯動與書院創辦

上海格致書院是由來華西人、開明官員與口岸知識分子協力創辦與管理的。<sup>⑤</sup>這在書院經費、設備來源和管理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

還在 1873 年，英國駐滬領事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便提議在上海設一專門學校<sup>⑥</sup>，主張這一學校專為華人瞭解西學、並使中西人士由此相親相近，但西人並不在內讀書，辦院經費由中西人士捐助<sup>⑦</sup>。這一設想得到有關中西人士的熱烈響應。經過幾年的籌辦，到 1876 年正式成立。書院歷時近四十年，到 1914 年正式關閉。

書院的創辦經費與相關設備，都是由中外人士共同努力籌集的。

截止 1875 年，書院募集到開辦經費凡 6,979.83 銀兩，1,541 洋元，其中白銀 5,313.5 兩、洋錢 630 元，係中國官員捐助，分別佔總數的 73% 與 40.9%，其餘部分則來自來華西人。<sup>⑧</sup>

西人捐款者，包括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00 兩銀，傅蘭雅 50 洋元，其餘大多來自洋行，包括祥生、怡和、滙豐等，數目從二三百兩到一二十兩多少不等。書院的科學儀器和各式展品，包括比利時政府贈送的全副精緻的化學儀器，均由麥華陀等通過各種渠道募集而來，價值二十多萬銀兩，運費也是外國商人資助的。

中國官紳捐助的經費，可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官款。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李宗羲捐款都在千兩以上。<sup>⑨</sup>上海道台馮煥光所捐最多，達 2,000 兩。其餘，津海關道丁壽昌（300 兩）、直隸正定鎮總兵吳育仁（213 兩）、江西九江道沈保靖（213 兩）、前上海道台沈秉成（200 兩）、署天津海關道孫士達（200 兩），數額都是 200 兩或以上，江南製造局總辦、輪船招商局總辦或會辦鄭藻如、唐廷樞、徐潤、盛宣懷等，都捐了 100 洋元或 100 銀兩，輪船招商局會辦朱其昂、朱其詔兄弟捐了 200 洋元。還有一部分經費是一些熱心人士以個人身份捐助的，徐壽、王榮和、李鳳苞等，各捐了 50 洋元或銀兩。書院日常活動經費，也來自個人捐助，唐廷樞、唐廷植、徐潤、鄭觀應、葛繩孝、朱其昂、盛宣懷等 34 人，承諾每人每年捐助 6 洋元。這筆經費被稱為常捐。

書院的日常管理，也是中西相關人士共同負責的。

書院在籌備期間，已成立董事會，以後一直由董事會管理，書院一切重要事項，包括土地徵用、房屋建造、儀器管理、教習聘用、講座開設、經費使用等，均由董事會決定。董事會成員一直由中西兩方面人士共同組成。

歷任西人董事，除了麥華陀，主要還有：（1）福弼士（F. B. Forbes），美國商人，出生於紐約，1857 年來華，為旗昌洋行老闆。（2）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英國傳教士、漢學家，1847 年受派來華，長期在上海等地生活，曾主編上海第一份中文雜誌《六合叢談》。（3）傅蘭雅（John Fryer），英國人，1861 年來華，先後在香港、北京等地傳教、教書，1865 年到上海，任英華書院校長，次年兼任《上海新報》主筆。1868 年受聘為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編譯，任職達 28 年，為翻譯館譯書最多的學者。他擔任格致書院董事期間，負責設計書院西學課程，為書院發展提出種種設想，為西人董事中任事最久、幹事最多者。1896 年辭職赴美國加州大學任教。西人董事還有美國傳教士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著名建築師、英國人敬妥瑪（Thomas William Kingsmill），著名律師、英國人擔文（William Venn Drummond），著名傳教醫師、美國人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

這些西人董事背景不同，專業不同，但他們都有較長時間生活在中國，都對中國問題抱有濃厚興趣，有些人對中國文化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其中，福弼士 1873 年至 1874 年任亞洲文會會長，曾撰專著詳細介紹中國、朝鮮等地植物情況。偉烈亞力所著《中國文獻錄》一書，向英文世界介紹了二千多部包括古典文學、數學、醫學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中國古典文獻，所著《中國數學科學札記》一文，介紹中國在數學方面的貢獻，在當時漢學界享有盛譽。敬妥瑪對中國地理、歷史均很有研究，曾應山東巡撫聘請，測量運河北段，後來又調查山東和四川的煤礦資源。他旅居上海多年，曾任上海皇家亞洲文會會長，著有《銅錢與茶葉貿易》、《中國內地的交通》等。他提出的中國文明雅利安起源說，用近代民族學方法解釋中國文明起源，在眾多中國文明西來說中自成一家之言。擔文在 19 世紀 70 年代前期就到上海執業，是上海資格最老的律師之一，先後任連厘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工部局法律顧問，1878 年以後獨立開設律師事務所，並與多位律師開辦聯合律師事務所，以仗義執言、敢於為華人辯護而著稱。

麥華陀等西人之所以積極倡導建立上海格致書院，並堅持不懈地為書院的發展出力，在於他們當時都普遍地對中國與世界的未來抱樂觀主義。19 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列強之間，由於忙著在歐洲、非洲與中東爭奪勢力範圍，尚未聯手侵略中國。對於中國來說，在太平天國與捻軍相繼被鎮壓以後，獲得了相對平靜的發展時期，中外關係相對緩和，機器製造、航運、電報、留學等各項改革事業逐步展開。這一時期，由於世界範圍內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發現與發明，包括進化論的盛行，電的發明與使用，蘇伊士運河的開通，西方資產階級對於未來充滿信心。他們相信，有保證的自由的獲得，至善至美的文明的實現，都是可以期待的。◎1888 年，美國作家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所撰烏托邦小說《回顧》，對未來社會富裕、文明、和諧願景的想像，轟動一時，便是這種樂觀主義情緒的結晶。在這種普遍樂觀的文化氛圍中，向那些被他們認為是野蠻的、落後的不發達地區傳播科學技術，推廣西方價值觀念，是歐美資產階級的共同理想。

格致書院歷任華人董事中，最重要的是唐廷樞、徐壽、王韜與趙元益。王韜留待後論，唐廷樞是著名買辦、實業家，早年就讀於香港馬禮遜學堂等教會學校，後在上海海關、洋行中任職，1873 年出任輪船招商局總辦。他通外語、有才識、有資財，又肯幹實事，於格致書院籌建出力頗多。他與弟弟唐廷植都是格致書院日常經費的捐助人。徐壽是著名科學家，1862 年應曾國藩之召，赴安慶內軍械所研製輪船。1867 年攜子徐建寅到上海襄辦江南製造總局，翌年創辦翻譯館，為館中最重要譯員之一。書院早期的日常工作，包括徵地建屋、經費籌措、儀器募集、房屋出租、日常管理，多由他負責。趙元益是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員之一，譯有醫書多種，1887 年中舉，翌年作為醫官隨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回國後仍以翻譯為事。王韜在 1894 年生病以後，他接替王韜在課藝方面的工作。

華人董事還有：王榮和（生卒年不詳），時在江海關道任翻譯。書院正式開辦之前就被選為董事，其職責是加強與上海道台溝通，協助徐壽等向中國官紳募捐；華蘅芳是與徐壽齊名的科學家，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員；徐建寅是徐壽次子，著名洋務幹才，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員，曾奉命赴德國考察工業技術，訂購鐵甲戰艦，歷任山東機器局總辦、金陵機器局會辦等；徐華封，徐壽三子，早年參與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書工作，1876 年赴魯指導山東製造局工匠安裝機器和設備，1878 年任格致書院中方董事，後任江南製造局工藝學堂化學教習；張煥綸，上海地方頗有聲望的士紳領袖，新式小學梅溪書院創始人，南洋公學首任教務長；黃春甫，上海著名華人西醫

生，1854年即受聘擔任仁濟醫院院務；李平書，為上海地方紳商領袖，曾任廣東陸豐、新寧、遂溪等縣知縣及江南機器製造局提調，領導上海地方自治運動；聶雲台，祖籍湖南衡山，生於長沙，1883年隨父聶緝梨寓居上海，後隨傅蘭雅等學習英語及電氣、化學工程等，1894年任復泰公司經理，租辦華新紡織新局，旋任該公司總理，民國時期為上海著名企業家。

這些華人董事，或為買辦，或為富商，或為名紳，出身不同，職業有異，但他們都有比較深厚的西學素養，都對新式教育抱有濃厚的興趣。其中，徐壽、華蘅芳、徐建寅、王韜、趙元益、張煥綸等，都可以歸入柯文所說的口岸知識分子範疇。

華人董事之外，對書院創辦與管理支持力度更大也更為關鍵的，是一批開明官員，包括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李宗羲。如前所述，他們在書院創辦時，都捐助了數目可觀的款項，李鴻章特地題寫了“格致書院”四個大字作為匾額。書院開辦以後，一度經費困窘，李鴻章又讓著名商人胡雪岩捐助了5,000銀元（約合3,700銀兩）。<sup>⑨</sup>李鴻章特地批示徐壽，要他“務須實力參稽，多方招致，使中土藝學日興，人材日多，以裨實用。是為切盼”。<sup>⑩</sup>

南北洋大臣是同光時期負責地方外交事務的最高官員，他們的支持對於書院的運行至關重要。正是由於他們的支持，相關地方與部門的官員才會慷慨解囊，書院課藝的徵文、出版才能夠順利進行。

對於晚清通商口岸中西居民關係，以往人們較多地強調其矛盾、衝突、鬥爭的一面，這固然有其事實依據，但是，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中西之間還有另外一面的關係，也有交融、妥協、合作的一面。晚清上海華界與租界之間，就在市政建設、預防疾病、懲治犯罪、禁止鴉片等方面，有過許多合作，華界與租界當局甚至共同接待外賓，共同舉辦國際性會議。<sup>⑪</sup>本文所討論的中西共同辦學，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 二、中西協力與考課開展

格致書院考課是在中西董事共同努力下開展的。

1884年，主持書院事務的徐壽去世。翌年，書院中西董事商定，邀請上年剛從香港返滬的著名學者王韜擔任監院，俗稱山長。王韜自1885年秋上任，直到1897年5月去世，擔任監院長達12年之久。1894年以後，因身體多病，院務基本未管，故其實際在任時間是1885年至1894年，所幹之事主要是考課。

考課之動議出於傅蘭雅。格致書院以講求自然科學知識為主，王韜雖然在西學方面名氣很大，但他對於科學知識並不內行。鑒於當時希望瞭解自然科學、工程技術方面知識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夠在這方面投入精力、由淺入深、由粗及精持續鑽研下去的人很少。傅蘭雅提出，可以通過考課方式，實行有獎徵文，“欲與海內人士結文字緣，由文字引伸之，俾進於格致”<sup>⑫</sup>。他認為：中國“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幾乎全部是做文章，因此，這門藝術傳承了幾個世紀，在文體、選詞和組織各方面已經達到了完美的境界，這是在西方國家從未有過的。為了使西方知識受到知識分子的歡迎，必須很好地利用現有的民族特色。因此，可以說做文章是一種能促使上層中國人對外國實用技術進行讀、想、寫的最有效的方法。藉此可以實現格致書院的主要目的。”<sup>⑬</sup>

對於傅蘭雅的提議，王韜高度認同。1885年7月，書院決定由王韜出面請有關“當道”，出題課士。<sup>⑭</sup>從日後實踐看，書院董事心目中的有關“當道”，主要是指北洋大臣、南洋大臣與關口岸城市的關道。

1886年春，格致書院對外發佈考課章程，載明考課宗旨、內容、考課形式與獎勵辦法等<sup>⑤</sup>，並開始舉行考課。這年春季課題，由蘇松太道邵友濂命題。此後一年四季正課，均按時舉行，直到1894年，連續九年，沒有中斷。命題人主要是口岸官員。從1889年開始，又增加了春、秋兩季的特課，專請北洋大臣與南洋大臣命題閱卷，春季北洋大臣，秋季南洋大臣。<sup>⑥</sup>

從課藝組織者角度看，王韜與傅蘭雅作為書院真做實幹的董事，其作用至關重要。

王韜在書院課藝產生過程中，至少有五項具體工作，即聯繫命題官員、刊發課藝題目、評點課卷與選刊優秀課卷、匯刻課卷、聯繫學生。

每一次邀請南北洋大臣與各位關道命題、閱卷，王韜都親自聯繫，有時一次命題要聯繫多次。盛宣懷檔案中，就存有許多封王韜聯繫命題、閱卷的信件。比如，1888年6月4日（光緒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函請盛宣懷命題，謂“格致書院夏季課藝，尚待我公命題，以為多士矜式”<sup>⑦</sup>。過了兩個月，盛宣懷還是沒能將考題寄來，王韜再次去信催促。<sup>⑧</sup>1890年冬季<sup>⑨</sup>、1893年秋季<sup>⑩</sup>，他都去信向盛宣懷催討課藝題目。

王韜還要請求有關官員閱卷，催討評審意見與課藝次第。1887年，王韜收到課藝之後，便寄呈盛宣懷，請其評閱，函稱：“格致書院課卷僅收得三十七本，比前數次少矣。敬呈台座下求賜鈞鑒，以定甲乙”<sup>⑪</sup>。1890年，他函催盛宣懷儘快評閱課卷：

己丑秋季課卷寄來已久，想當早經評定甲乙。凡在書院肄業士子，無不咸殷仰企，幾於望眼欲穿。夫以閣下持玉尺而量才，秉金篦以刮目，褒榮於華袞，貶嚴於斧鉞，一出言而奉為圭臬。凡經拔列前茅者，如登龍門，自展驥足。伏求即將鑒閱之卷，付之郵筒，俾得傳示儒林，用慰眾望。不勝幸甚，不勝盼甚。<sup>⑫</sup>

書院從1889年開始增加南北洋大臣命題，這一主意也出自王韜。1888年，他在致盛宣懷信中披露自己的想法：“格致為洋務之發軔，亦精華之所萃，樞紐之所存，必當分求南、北洋大憲總持其間”<sup>⑬</sup>。到了第二年，這一設想變成了事實。

遇到關道易人，而繼任者又不熟悉，王韜還得設法利用原有官場關係進行迂回溝通，以求繼續課藝事宜。1893年，東海關道易人，劉含芳繼任<sup>⑭</sup>，王韜與劉含芳素無往來，只好請盛宣懷從中協助。<sup>⑮</sup>

刊發課藝題目，是課藝徵文的重要環節。課藝題目擬定以後，王韜要將這些題目交由相關報紙刊發。通常，他還要附加一些解釋性文字，除了交代清楚何時截稿、稿件長短、用何規格紙張騰清等，還要對命題人有所介紹、對命題旨趣亦有所闡釋。

對於彙集起來的課藝，除了出題人要寫出評語、評定等第，王韜也要加以點評。從已刊課藝看，王韜的點評，長者近百字，短者一二十字，無論長短，均指出其文優劣所在，如評項藻馨所作《中國各大憲選派辦理洋務人員應以何者為稱職論》：“洋洋灑灑數千言，本本原原，咸能核要，是真能留心於時務者，惟中多習見語，豈英雄所見略同耶？此篇議論雖佳，核之題義尚多溢分”<sup>⑯</sup>。評葛道殷所作《格致之學中西異同論》：“作者於西學深造而有得，而於中國格致之學亦能深原扼要，立論具有根柢，洵傑作也。”<sup>⑰</sup>

匯刻課藝的工作也主要由王韜承擔。從1886年開始至1894年，書院將課藝佳作逐年刊行。入選課藝一般在考課次年編輯出版，1893年以前之課藝均由王韜選印。每年課藝前面均有王韜序言，交代考課命題與課藝選編情況。<sup>⑱</sup>

對於書院考課的開展，西人董事傅蘭雅的貢獻也相當重要。

首先，傅蘭雅向西人社會熱情介紹考課的情況，宣傳考課的成就。

課藝進行兩年之後，1888年初，傅蘭雅在《字林西報》上發表《中國文學與西方科學——格致課藝報告》，介紹課藝進展情況及其取得的成就。他認為，課藝很好地利用了中國文人擅長撰文這一民族特色，促使他們對西方科學知識進行閱讀、思考與表述，目的是使這些知識受到中國的理解、歡迎並獲得應用。課藝進行兩年了，現在看來，這一做法相當正確。“課藝的成功超過了當初的預想，這使得格致書院的影響更遠更廣，使它不僅在知識分子中發揮了作用，而且在高級官員中也發揮了效應”<sup>⑨</sup>。他認為，“總的來說，作為純粹的實驗，課藝是成功的，就像插入了一個楔子，最終會有助於仍待完成的偉大事業，即，打開這個國家的人民那迄今為止尚未開啟的頭腦和心靈，用西方科學各個領域的真理來啟蒙他們。”<sup>⑩</sup>報告認為課藝在最初兩年，進展平穩，規模逐漸擴大。“通過這種方式，格致書院的知名度不斷提高。它還確保了與一些高級官員的合作關係，並在一些最具影響力的地方，引起了人們對西方觀念的興趣。”<sup>⑪</sup>傅蘭雅對於參與命題、閱卷的中國高級官員，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參與這項事業的各個高級官員顯示出了當前中國需要的驚人洞察力，儘管他們的問題更多是關於政治經濟和商業而不是關於嚴格意義上的科學，人們依然會滿意地看到他們多麼愛國，看到他們從實用的、功利的觀點而不是僅從理論上來看待知識的態度”。<sup>⑫</sup>

課藝開展期間，經傅蘭雅等人努力，《字林西報》持續報導、評論書院考課情況，刊登考題的英譯文本。西人對於李鴻章的表現尤為讚賞，認為李所出的題目，要求應答者具備豐富的化學和電學知識，“這是開明的高級官員們渴望推動西方科學的例子”，並認為李的參與，極大地提高了課藝的吸引力，“每一個有這方面知識的人都渴望得到這位政治要員的青睞”。<sup>⑬</sup>1893年春，上海道聶緝槩給書院出了兩道題目，一道是進行中西語言文字比較，另一道是關於慈善問題，兩道題都要求學生同時關注中西的歷史與現狀。《字林西報》對這兩道題給予高度的評價：

每一個問題都由古代入手，這樣一方面可以認識並採用西方發明，另一方面還可以從古代中國的歷史中掘取智慧。我們該指責這種做法嗎？相反，我們不該從中看到值得稱讚的東西嗎？當我們的祖先還是半野蠻人時，他們的文明已經非常發達，這些文明引領中國人成功走過漫長歲月，因此儘管不能與西方的現代文明匹敵，但也不應該被輕視或拋棄。改變必須要循序漸進，相信這一點也就足夠。倉促推行未經試驗的計劃，既對中國不利，也對西方國家不利，它必須要做出適應中國國情的改變。<sup>⑭</sup>

書院西人董事認為，看了課藝題目，“就會明白帝國上層人物的頭腦中所發生的轉變。這項計劃為官員與平民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渠道，引起了大家對有用而實際的西方知識的渴求，這項計劃本質上是非常有益的”<sup>⑮</sup>。

其次，傅蘭雅還親自給課考出過兩次題目。一次是1889年冬，那次按照慣例應是天津道胡燏棻命題，不料他的題目遲遲沒有寄來，於是，傅蘭雅自命其題，也自出獎金。另一次是1893年秋季，獎金亦由他自掏腰包。這次按照慣例應是東海關道命題，但那時恰逢關道易人，王韜懇請盛宣懷從中幫忙聯繫新任道台劉含芳命題，未能如願。估計傅蘭雅見此困境，臨時出面救場。<sup>⑯</sup>按照書院考課章程以及以往慣例，為書院考課命題者，或為道台，或為南北洋大臣，傅蘭雅在命題遇到特殊困難時，突破慣例，主動救場，正凸顯了他對書院考課的滿腔熱忱。

再次，傅蘭雅還為考課做了一些輔助性工作。他在漢口路上開設的格致書室，是格致書院考課的對外聯絡地點。上海本地考生領取獎金、查看課藝批語均到這裡，外地考生的課卷也可以寄

到這裡。書院規定，對於閱卷人的課藝評語，可以查看、抄錄，但不能將原卷帶走。<sup>②</sup>他經營的格致書室，是相當成功的圖書銷售處，在全國許多地方有代銷點。書院課藝印出以後，就借助這一網絡，銷售到全國各地。

### 三、開明官員竭誠推助

考課作文得以順利進行，課藝得以彙集出版，並產生廣泛影響，關鍵因素有二：一是有一批有較高社會地位與卓越才學的命題人與閱卷人；二是有相對穩定的經費，包括固定的、額外的獎勵經費。這兩個因素是連在一起的，因為課藝費用除了有一部分來自書院的經費，還有一部分即來自命題官員。

書院一年四季的正課，命題人主要為沿海各海關道台，包括設在上海的管理江海關的蘇松太道邵友濂、龔照瑗、聶緝槩、劉麒祥，設在寧波的管理浙海關的寧紹台道薛福成、吳引孫，設在天津的管理天津、塘沽、秦皇島等海關的津海關道周馥、天津道胡燏棻<sup>③</sup>，設在煙臺的管理東海關的登萊青道盛宣懷、李正榮，還有浙江布政使許應鑠、江南製造局翻譯傅蘭雅、江海關稅務司裴式模、輪船招商局總辦鄭觀應，總共 14 人。其中盛宣懷、吳引孫各命題 6 次，聶緝槩 5 次，龔照瑗 4 次，薛福成 3 次，其餘一、二次不等。書院特課命題人均為南北洋大臣，春季由北洋大臣命題，秋季由南洋大臣命題。凡 4 人參加，即李鴻章、曾國荃、沈秉成與劉坤一。從 1889 年至 1893 年<sup>④</sup>，凡命題 10 次，出題 25 道。其中，北洋大臣李鴻章 5 次，出題 15 道；曾國荃 1 次，出題 3 道；沈秉成 1 次，出題 1 道；南洋大臣劉坤一 3 次，出題 6 道。有資料顯示，江、津、東、浙四關道參與季課命題，是在課藝開始時已經確立的規則。南北洋大臣參與特課命題，則是在考課開始後的第三年，即 1888 年確定的。<sup>⑤</sup>

課藝獎金，一般每次 25 兩，通常獎勵優異者前幾名，即超等首名 10 兩、二名 7 兩、三名 5 兩、四名 2 兩、五名 1 兩，加獎則由命題人另外提供。例如，1886 年冬季加獎銀 15 兩，1887 年加獎銀 18 兩。9 年間正課 46 次，書院花獎金 1,135 兩，命題人提供加獎銀兩 240 兩 2 錢、洋錢 3,552 元。其中最豐厚的一次，為 1893 年李鴻章所命題的春季特課，加獎達 325 元之多。<sup>⑥</sup>

近代中國海關眾多，管理海關的道台很多，廣州有粵海關，瓊州有瓊海關，廈門有廈海關，福州有閩海關，鎮江有鎮海關，那麼，為什麼只是管理江海關、津海關、東海關、浙海關的這四個道台成為主要命題人呢？<sup>⑦</sup>這四個關道參與命題、閱卷、出錢獎勵，自 1886 年以後，幾成定制，即使關道易人，但參與此事不變，新的關道會繼續命題、閱卷、出錢。為上海格致書院命題、閱卷、出錢，並非這些關道的份內工作，也沒有資料證明當初有過書面或口頭約定，但是，有一個現象相當清楚，即這些關道都處在南北洋大臣的管轄之內。按照當時的制度，南北洋大臣對於這四個關道，具有任用揀名權、業績考核權、彈劾權與調查權。<sup>⑧</sup>四關道參與格致書院事宜，很可能是在南北洋大臣授意或支持下進行的。

南北洋大臣當中，北洋大臣李鴻章的作用更大。格致書院創辦時，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李宗羲同為重要捐助人，但到書院開展課藝活動時，李宗羲已經去世。<sup>⑨</sup>其繼任者曾國荃、沈秉成與劉坤一雖然也都支持書院工作，但諸人在任時間均遠不及李鴻章長。

有跡象表明，格致書院創辦，上海以外的捐款官員中，包括丁壽昌<sup>⑩</sup>、孫士達<sup>⑪</sup>、吳育仁<sup>⑫</sup>與沈保靖<sup>⑬</sup>，幾乎都是李鴻章的部下與親信。其中，津海關道丁壽昌、署天津海關道孫士達都是李的下屬。丁壽昌與李鴻章是同鄉，因跟隨李鴻章鎮壓太平軍，一路升到天津道與津海關道的。孫

士達曾協助李鴻章處理天津教案，表現突出，成為李的心腹，他署理津海關道，就是李鴻章推薦的。沈保靖是李鴻章的親信、幕僚，其父與李鴻章父親是好友，他 1865 年奉李鴻章命規劃江南製造局，1872 年授江西廣饒九南道。由於這層關係，上海格致書院創辦時，他成為重要捐助人之一，也是沿海口岸城市以外地方官員中唯一的捐款人。直隸正定鎮總兵吳育仁，是李鴻章同鄉、部下，是淮軍中能征善戰、也是李鴻章最為倚重的將領之一。上述丁、孫、吳、沈四人，與格致書院都沒有直接關係，他們捐款，很可能都是出於李鴻章的授意。

再考察一下課藝開始以後的 9 年時間裡，上述江、津、東、浙四個關道實際擔任者的人脈，也可以發現，他們多與李鴻章有比較密切的關係。

首先，各位關道中，盛宣懷對書院的支持最大<sup>⑨</sup>，他命題次數最多（6 次）。所資助的經費，除了在考課時添賞花紅之外，為了支持書院工作，他自 1887 年起，私人每月資助王韜銀二十兩，另從其主管的輪船招商局公款中，每月給王韜支取幹修銀二十兩。<sup>⑩</sup>盛宣懷對於書院事務也格外盡心，所出題目皆經過精心思慮，批閱課藝也格外仔細。據稱：他“每卷皆親自披覽，旁注眉批，極為詳細。觀察於躬親政事之暇，於文字因緣也能體會入微至此，閱者之識力，與作者之心思，有如針芥相投，鑿空衡平，真毫髮無遺憾矣。閱文如此，豈有湮沒人才之歎哉！”<sup>⑪</sup>眾所周知，盛宣懷與李鴻章關係特深，他是李的幕僚，自進入官場以後，仕途方面幾乎每進一步，實業方面幾乎每辦一項，都與李鴻章的提攜、支持、呵護密不可分。

其次，命題人邵友濂<sup>⑫</sup>、龔照瑗<sup>⑬</sup>、薛福成<sup>⑭</sup>、周馥<sup>⑮</sup>、李正榮<sup>⑯</sup>、聶緝槩<sup>⑰</sup>、劉麒祥<sup>⑱</sup>、胡燏棻<sup>⑲</sup>，多與李鴻章有密切關係。邵友濂是李鴻章姻親，他署理出使俄羅斯大臣，出任蘇松太道、台灣布政使等職，都與李鴻章有關。龔照瑗是李鴻章同鄉，其仕途的每一步，由知縣而道員，而辦理金陵機器局、洋務局等，而任蘇松太道、遷浙江按察使、四川布政使、駐英法義比等國公使，都與李鴻章的提攜有關。薛福成曾為李鴻章幕僚，也是洋務方面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的難得人才，對李鴻章洋務事業贊畫尤多。周馥是李鴻章幕僚與心腹，其才華向為李器重，其擔任知府、署永定河道、署津海關道、署天津兵備道，都與李鴻章直接有關。李正榮是李鴻章表弟，也是同鄉，他參加鎮壓太平軍、任知縣、任登萊青道，都出於李鴻章的提攜。聶緝槩為李鴻章恩師曾國藩之婿，與李關係熟稔，是活躍在上海、江蘇、浙江一帶的著名洋務官僚。劉麒祥是曾國藩姻親、陝西巡撫劉蓉之子，是李鴻章子侄輩，其任駐法國公使館參贊、在福建辦理洋務、任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總辦、署理蘇松太道，都是在李鴻章等人庇護下工作的。命題人中，胡燏棻輩分較高，出身也高（進士），在任天津道期間，是最為開明的官員之一，甲午戰爭前後提出過著名的變法主張，與李鴻章是政治同道。

綜上所述，可以說李鴻章是格致書院創辦、課藝舉辦的最為重要的政治支柱。

當然，江、津、東、浙四位關道積極參與格致書院課藝工作，並非完全是看李鴻章的面子，更為重要、也更為根本的原因，在於課藝所討論的問題，與四處海關所在口岸城市的特點、與這些關道工作的特點有內在關係，與這些口岸城市官員的開明化趨向有關。

自鴉片戰爭以後至甲午戰爭以前，通過《南京條約》（1842）、《天津條約》（1858）、《北京條約》（1860）與《中英煙臺條約》（1876）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陸續被迫開闢了一大批通商口岸，累計 34 個。西方列強憑藉堅船利炮，利用清朝統治者在外交方面的顛預無知，在許多口岸設立租界。到 1894 年以前，所設租界已有 12 個，包括上海 3 個（英、美、法）；廣州 2 個（英、法）；天津 3 個（英、法、美）；漢口、廈門、九江、鎮江各一個英租界。列強還在



一些地方設立了外人居留區，包括寧波、福州、營口與煙臺外人居留區。

如果將租界、居留地連帶一起考慮，加上被割讓的香港、被佔領的澳門，那麼，1894年以前，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就有為數可觀的城市或景點呈現異樣的色彩。如果從北向南數起，它們依次是營口、天津、煙臺、上海、寧波、福州、廈門、香港、澳門；如果沿著長江從東向西數起，則有上海、鎮江、九江、漢口。這些塗抹著異域色彩、飄散著外洋氣息的城市與景點，是在外力入侵以後發展或興建起來的，是在中國傳統城市體系之外出現的另一類城市。

這些口岸城市居住著數量不等的外國人。其中，上海最多，1890年已達4,265人；天津其次，1890年已有612人。外國人在上海及其他各租界都建立過不同於中國行政系統的管理機構，實行過與中國不同的管理制度，包括議事與決策機構納稅人會議，行政機構工部局，警察機構巡捕房，司法機構領事法庭與會審公廨，還有准軍事化組織萬國商團。通過這些機構的建立，制度的實施，外僑基本上將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體制移植進來。這些口岸城市建有許多外國風格的建築，包括住宅、教堂、醫院、學校、街道、公園、運動場，陳列著體現西方科學技術的各類機器與設施。西方人在這裡經商、傳教、興學、辦報，也在這裡打獵、賽馬、賽船、打球、看戲、跳舞。他們將歐美的物質文明、市政管理、議會制度、生活方式、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審美情趣都帶到這裡，使這裡變成東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塊西方文化“飛地”。

這些地方展示、體現的西方文化，與華界產生巨大差距，這會極大地刺激著華人社會，推動著中國學習西方的步伐。還在1872年，《申報》就載文比較上海租界與縣城的差距：

上洋各租界之內，街道整齊，廊簷潔淨，一切穢物、褻衣無許暴露。雜土拉雜，無許堆積。偶有遺棄穢雜等物，責成長夫巡視收拾，所以過其旁者，不必為掩鼻之趨已，自得舉足之便。甚至街面偶有缺陷泥濘之處，即登時督時工為之修理。炎天常有燥土飛塵之患，則常時設水車為之淺灑。慮積水之淹浸也，則遍處有水溝，以流其惡。慮積穢之薰蒸也，則清晨臥糞擔以出其垢。蓋工部局之清理街衢者，正工部局之加意閭閻也。……試往城中比驗，則臭穢之氣，泥濘之途，正不知相去幾何耳。<sup>⑩</sup>

包括香港、澳門與各地租界在內的深受西方影響的城市發展，對於國人世界觀念的改變，對於變法意識的刺激，對於中國文化的反思，其影響之大遠遠超過任何紙面的議論。正如英人干德利（R. S. Gundry）所說：

曾有一次，人們有力地指出，上海的工部局是在中國最好的宣教士。這意思是說，上海的外國租界是一個實例，闡明西方文明的優點。每年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由帝國他處走過上海，他們可以看到美麗的建築、整潔的街道，燃著電燈，或瓦斯燈；他們可以看到機器、自來水、電報、電話、火輪船、公園。他們在這裡所得到的印象，必然多少傳到內地去。<sup>⑪</sup>

長期生活在上海的鄭觀應，對此感受特別深刻：“余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僕地皆置不理，唯掩鼻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sup>⑫</sup>天津等地租界無不具有這種示範功能。

口岸城市的興起，口岸城市與內地城市的巨大反差，產生一個重要的影響，即口岸城市中國官員的開明化趨向。

無論是在最大租界所在地上海，最多租界所在地天津，還是在外僑居留地寧波、煙臺，都

有專門負責處理涉外事務的地方官員，通常是海關監督兼地方道台，簡稱“關道”。

清朝在康熙年間，曾開放海禁，設立粵、閩、浙與江海關（設在上海），負責徵收國內外海上貿易稅收。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鑒於海盜商人非法活動猖獗，清廷下令僅留粵海關一口進行對外貿易，停止另外三口的對外業務。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以後，規定五口通商，粵海關繼續此前業務，江、浙、閩海關實際上是恢復對外貿易業務。有所不同的是，近代以前海關只涉及洋貨問題，五口通商以後，隨著各口岸外國人絡繹而來，海關所在地還涉及洋人問題。清政府以所來洋人多與貿易相關，並綜合權衡對外交涉的官位品級等因素，乃決定以管理各口海關的道員，為處理涉外事務、與駐各口外國領事等級平行的官員。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通商口岸越開越多，各處海關由所在地道台擔任監督，各口岸涉外事務由道台負責處理，成為慣例。於是，“關道”成為一專用名詞，關道所處理事務也與其他地方道台有所不同。

由於工作環境、工作對象與工作性質的不同，關道逐漸成為晚清中國官員中比較特殊的群體，關道的涉洋色彩也就凸顯出來。這是由兩方面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

一方面，關道辦理地方外交，與外國領事周旋，接待來訪的外國要員；處理涉外稅務問題，處理因租界或居留地而產生的涉外事件；向總理衙門、各地總督及巡撫報告各類外國信息、寄送所蒐集到的外國報紙與新譯外國書籍；接待出使外國的使臣；領導地方洋務運動，負責地方所辦洋務企業（如江南製造局）。按照傳統的衡量地方官員工作難度的標準來看，這屬於典型的衝、繁、疲、難四者兼具的最要位置，朝廷在任命此類官員時，本來就會考慮其個人稟賦與處理涉外事務的能力，就會傾向於任用那些具有涉外經歷、富有國際知識、善於應付複雜局面的人。比如，上海在被確定為通商口岸時，道台是顏以燠，朝廷在考察他處理涉外事務能力時，發現他思路混亂，不夠幹練，於是將他撤職，另換以公正廉明、誠實穩練著稱的宮慕久來擔任。宮慕久在任四年，果然眾口稱好，“夷情頗為悅服”<sup>⑥</sup>。日後，朝廷任命買辦出身、會說英語的吳健彰擔任上海道，任命具有處理涉外事務經歷的陳欽、黎兆棠擔任津海關道，任命具有豐富的國際知識、務實幹練的薛福成擔任寧紹台道，都是出於同一思路。

另一方面，各關道在自己任地，對於外國租界或外僑居留地的市政建設與管理、制度安排，外僑的生活習慣、道德風尚、價值觀念，年深月久地耳濡目染，自會從略有所知變得深有所知，從而成為清朝官員隊伍中的知洋派。上海道劉瑞芬、寧紹台道薛福成先後在離任後擔任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津海關道鄭藻如、登萊青道張蔭桓日後都曾擔任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大臣。關道成為出使大臣人選的重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在口岸城市的任職經歷，對於他們的學識增長、才能歷練是有積極意義的。

個人素質與人地影響，這兩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其務實幹練的素質決定了這些關道會比較客觀地看待租界或居留地的外國人、外國器物、外國制度與外國風俗習慣，也會比較理性地、平實地處理涉外事務。與此同時，他們也會深切感受到生活在租界或居留地的華人所遭受的來自租界當局或洋人的歧視與欺凌，時常受到外國領事的冷遇與刁難，其愛國情感會較那些不涉外官員更為真切、強烈與持久。他們是梁元生所說的“雙視野人”，一隻眼睛看著租界或居留地的發展與繁榮，一隻眼睛看著內地的落後與衰敗，兩相對比，他們的恥感文化會格外深沉，由此成為清朝官員隊伍中不斷呼籲變法的開明派。如前所述，格致書院課藝討論的最主要議題是洋務問題，那是各位關道日日都會遇到的現實問題，所以，他們會熱情投入。

#### 四、士子響應、報刊介入與課藝影響

士子踴躍應考，是課藝成功最為重要的社會基礎。

從 1886 年至 1894 年的九年間，共有多少人參加考課，已不得而知。從一些零星的資料可以知道，1886 年春季有 92 人參加，1886 年秋季有 83 人參加，1888 年春季有 57 人參加，其他年份、季節不詳。<sup>④</sup>九年中，獲超等者 418 人次，特等者 683 人次，一等者 989 人次，三者累計 2,090 人次，涉及 88 人。<sup>⑤</sup>獲獎 5 次以上的有 7 人，得獎最多的是楊毓輝，有 14 次。應徵士子來自全國近十個省區，包括江蘇（含上海）、浙江、廣東、安徽、福建、湖南、天津、河南與山東。劉明根據《格致書院課藝》所載資料統計，獲獎 88 人中，江蘇籍（含上海）41 人，浙江 15 人，安徽 6 人，廣東 5 人，湖南 3 人，福建 2 人，天津、河南、山東各 1 人，不詳者 13 人。<sup>⑥</sup>籍貫明確的 75 人中，屬於粵、閩、浙、滬、蘇、魯、津等沿海地區的 65 人，約佔 87%。

應考士子的年齡，由於缺乏確切資料，無法細緻分析。但是，從一些零散的資料，可以看出年齡分佈的大致情況。其中鍾天緯、趙元益年紀較大，應試時都已五十來歲。許克勤、李經邦，應試時三十大幾歲、四十來歲。秦錫田、葉瀚、于鬯、陳漢章、吳昌綬、項藻馨等，應考時二十幾歲、三十來歲。這些應試士子，有些人本來已經學有所成，頗有名氣。比如，鍾天緯 1872 年就入上海廣方言館學習，1875 年應徐建寅之邀，參與籌建山東機器局；1880 年應駐德公使李鳳苞之邀，隨使德國兩年，回國以後繼續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工作多年，參與過多部西書的翻譯，也參與過多項洋務企業的活動，是西學素養相當豐厚、對西學確有真知灼見的人。趙元益本是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員，參與翻譯西書多種，後來又成為格致書院董事。這些人本來就是中國接引西學、興辦洋務的積極踐行者，他們撰文參考，提升了應試士子的西學檔次。

應試士子中，年紀最大的是沈毓桂。此人 1807 年出生，江蘇吳江人，開埠初期就來到上海，協助艾約瑟（Joseph Edkins）、偉烈亞力、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等西人譯書，1868 年起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聘為《教會新報》（後改名《萬國公報》）中文編輯，為林樂知主要中文助手，長期主持該報。1881 年協助林樂知創辦中西書院，任中文教習。他開始參加格致書院考課的那一年（1889），已是八十有二的耄耋老人，比王韜還大二十多歲。<sup>⑦</sup>應試士子中，年齡最小的可能是錢志澄。他是浙江烏程人，1888 年參加書院冬季課考，獲超等第一名，其時年僅 20 歲。<sup>⑧</sup>由此可見，應試士子的年齡幅度相當寬闊。

以在書院的身份而論，這些應試士子與王韜是兩類人，一為學生，一為教師，但從變法思想角度而論，他們與王韜均可以籠統地歸為沿海口岸知識分子。正是他們與乃師王韜、命題官員共同創造了《格致書院課藝》這樣的知識產品。

《申報》、《字林滬報》等多家報刊的介入，是眾多士子得以參與、課藝得以成功舉辦、獲得廣泛社會影響的重要因素。

首先，報紙是聯繫書院、教習與考生的媒介。

格致書院自 1876 年開辦以後，一直有招生授課的設想，也幾經努力，均未如願。因此，書院開辦以後的十多年間，主要是舉辦科學知識展覽與講座，一直沒有固定的學生。參與格致書院課藝的學生，並不像當時其他許多書院那樣（如江陰南菁書院、杭州詒經精舍），住校聽老師授課，而是通過報刊、信件，與書院發生聯繫。他們此前大多數與書院沒有什麼關係，甚至未謀一面，而是看到報紙上登載的題目，然後答題作文，將課藝寄給書院。課藝等第評出來以後，也是

通過報刊發佈信息，包括獲獎名單、花紅金額、領獎辦法。這樣，報刊在考課舉辦、課藝形成的過程中，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因素。

刊載格致書院課藝信息、參與課藝宣傳的報刊有《申報》、《字林滬報》、《益聞錄》與《新聞報》。

《申報》與《字林滬報》都是自 1886 年考課開始時就介入這方面的工作。《申報》歷史眾所周知，毋庸贅言。《字林滬報》，1882 年 5 月 18 日創辦，是由北華捷報館創刊、字林洋行發行的中文日報，總主筆由英文《字林西報》總主筆巴爾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兼任，另聘戴譜生、蔡爾康為華人主筆。新聞部分主要譯自英文《字林西報》，文藝部分則由華人主筆負責。對照《申報》與《字林滬報》所載有關書院課藝信息，有時文字基本相同，有時則有所差異。例如，兩報對於第一次課藝信息的發佈，《申報》的文字是：

#### 格致書院春季課題

格致書院中西董事近擬仿照上海道憲求志書院章程，每年春夏秋冬，分為四課，茲特稟請道憲邵筱村觀察命題課士，其題為《陳湯甘延壽論》。出題之後，無論路之遠近，以四十五日為限，四月杪截收。所有章程早經登報，課卷悉由自備，送交格致書院帳房，俟取定後，在前列三名者，例有獎賞，其餘亦依次饋賞聊助膏火，其意欲令中國人士講求富強之學，而由格致為之基，以博通夫西學也，亦殊足嘉已。<sup>⑨</sup>

《字林滬報》的文字是：

#### 格致書院春季課題

格致書院分春夏秋冬四季出題課士，列前茅者備有獎賞，以昭示鼓勵，本係仿照上海道憲求志書院章程也。今中西董事稟請道憲邵小村觀察命題，以為多士矜式。其題為《陳湯甘延壽論》，限期四十五日交卷。其卷目備用白摺式，即交格致書院帳房。其章程前已登錄。此次僅有一題，因春季為時太促之故。按格致書院創設本意，原欲以格致為基，而博通西學，兼及乎富國強兵之要，所保固甚廣也。<sup>⑩</sup>

兩報發佈信息的時間都是 4 月 16 日，信息要素也都相同，但是，措辭造句各有不同。這說明，報紙在發佈此類信息時，並非簡單地照用書院所提供的文字稿，而是另外還投入了自己的精力。

自 1890 年開始，《益聞錄》加入了對課藝宣傳的行列。《益聞錄》，1879 年 3 月 16 日（光緒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創刊，是依託法國天主教會創辦的中國天主教第一份中文刊物，由上海徐家匯益聞報館出版發行，由李林主筆。<sup>⑪</sup>《益聞錄》對於格致書院課藝的介紹，主要是發佈課考題目。將其所刊內容與《申報》相對照，完全相同。《申報》為日刊，《益聞錄》為半月刊，《益聞錄》可能就是轉載《申報》信息以資擴大影響而已。

《新聞報》是近代上海與《申報》齊名的一份報紙，1893 年 2 月 17 日創刊。初期由中外商人合資興辦，英國人丹福士（A. W. Danforth）為總董，斐禮思（F. F. Ferries）為總理，中國人張叔和為主要出資創辦人。日後所有權發生過多次變化。《新聞報》自創辦以後就持續報導格致書院課藝的信息，其風格與《申報》類似，既發佈考課題目，並對考課的題目進行評議，也發佈課藝評閱的結果。

《申報》、《字林滬報》、《益聞錄》與《新聞報》，是甲午以前上海最主要的中文報刊，其創辦都有西人背景，但是主持其筆政的都是與王韜類似的口岸知識分子。王韜在 1884 年回滬以後，曾主持過一段時間《申報》筆政，後因書院事務繁多才辭去這一工作。在王韜擔任格致書

院山長那段時間，主持《申報》、《字林滬報》、《新聞報》筆政的學者，為錢昕伯<sup>②</sup>、何桂笙<sup>③</sup>、黃協塤<sup>④</sup>、袁祖志<sup>⑤</sup>、蔡爾康<sup>⑥</sup>、高太癡<sup>⑦</sup>等，諸人都是王韜好友，錢昕伯還是王韜的女婿。這些人的學術背景也與王韜差不多，多為很有才華但在科舉道路上發展不順者，唯《益聞錄》主筆李杕的學術背景與王韜等有異，他受過嚴格的教會學校教育，具有良好的西學背景。

《申報》等在刊載課藝試題等相關信息時，也會附加一些額外的內容。有的是對命題官員的介紹，有的是對試題的補充與評論。比如，《申報》在刊載薛福成為 1888 年秋季所命題目時，便附加一段解釋性文字：“觀察命題之意，早已胸有成竹，智珠在握，慧鑒獨操，猶未敢以之自是也，故博採旁詢，不詢於多士，蓋以上海為洋務淵藪，必多通今達古之士，抒其偉論宏議，以自陳其所見，上裨於國是，而有足以副觀察之殷殷垂詢者。且觀察有云，此題非精心考核，似難著筆。”<sup>⑧</sup>再如，1889 年 5 月 24 日《字林滬報》在刊登浙海關道吳引孫所出題目時，有這麼一段介紹文字：

吳福茨觀察，品重璠璣，望隆山門，筮仕京華，十有餘載，當軸鉅公，無不倚重，群以指臂相資。宏才碩學，經濟文章，久已照耀一時。平日留心時事，見中國鴉片為患，無術挽回，耗財力，壞心術，莫此為甚。近來土藥業已取捐，民間私種不少，老成謀國者謂鴉粟必須禁止，而漏卮殊大，何日能彌，心竊憂之。至於養蠶一節，不過盛於吳興一帶，他處尚未能遍行。現聞寧波稅司力籌興辦，將必廣求成法，冀獲良圖。此二者皆今日當務之急，而觀察時廑於懷者也。滬地人材薈萃，當必有一二傑出之士洞達時務，言之可行，以副觀察之所望者，不禁拭目俟之焉。<sup>⑨</sup>

有的時候，命題人所出題目比較簡單，報紙在發表時還會增加一些解題指南性文字。比如，吳引孫為 1893 年夏季所出題目兩道，一是比較中外刑律，二是比較中西醫學。《新聞報》便對此做了如下補充：

按：中國自皋陶為刑官，所有刑律經歷代數聖人而後定，五刑之設，由來已久，其間杜漸防微，原情度理，律之外又有例，用意至詳且盡。泰西最重刑司，各處設有專官，所定刑律，惟尚寬簡，亦復隨時修改，近日科條亦少密矣。中國古時醫術幾於失傳，古有醫官，今已廢去，亦無醫學以肄習。泰西則肄業有醫院，及其成也，有考試，頗鄭重其事。治病半賴乎器，近時化學愈精，醫理愈明，日東亦棄中法而習西醫矣。想書院肄業士子，必能綜中西之學以立論，上副觀察之明問焉。<sup>⑩</sup>

這類附加的文字<sup>⑩</sup>，對於士子解題作文有引導、提示和輔助作用，對於課藝的形成有重要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申報》還選載一批優秀的課卷。王恭壽的《中國創設海軍議》、趙元益的《備荒新說》、李鼎頤的《裁禁洋藥議》，都被刊載在《申報》上。據劉明統計，從 1886 年 9 月 7 日至 1893 年 8 月 1 日，《申報》共發表格致書院優秀課藝 19 篇。<sup>⑪</sup>此外，《萬國公報》也選刊了 5 篇。

《申報》在刊載這些文章時，時常會附有推介按語。比如，1889 年 10 月 1 日，《申報》發表錢志澄所作《北邊防務輕重緩急何在論》，文末便加了王韜寫的百餘字的附識<sup>⑫</sup>，介紹作者的身份，評述文章的妙處，還說了自己的感慨。《申報》在發表李經邦所作《潮汐應月說》文後，所加附識有 261 字<sup>⑬</sup>；在胡永吉所作《物體凝流二質論》文後，所加附識長達 274 字<sup>⑭</sup>。這些附識不但介紹了作者，還對文章所論問題作了發揮。《申報》在所載楊史彬關於採煉鋼鐵、織紡紗布

的文後<sup>⑧</sup>，加了 340 多字按語，除了介紹閱卷官員對此文的高度評價之外，還對作者在文章中流露出來的書生之見進行了討論。<sup>⑨</sup>這類介紹、評論與討論，既擴大了原有課藝的影響，也有助於人們對於所論問題的認識。

在 19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報刊是速度最快、影響最廣的新式媒體。《申報》等報刊的介入，使得格致書院的考課活動，插上了強勁的翅膀，超越了物理空間的阻隔，超出了上海城市，超出了沿海地區，擴展到廣大內地。如果沒有報刊作為媒介，有些士子是不可能獲得上海格致書院舉行考課的信息，更不可能撰文參加。最典型的是殷之輅。他是南京人，家境貧寒，從未參加過科舉考試，但博覽群書，關心時事，確有才學。他見到《申報》上刊登的格致書院考課廣告，便撰文應徵。結果，考中 1886 年秋季超等第十名。名單公佈出來，他喜不自勝，特地寫信給王韜，描述自己的心情，內稱：應考後，一直忐忑不安，“逮閱至‘十名殷之輅’五字，乃轉不知歎、不知喜，默然久之，展閱既竟，而神與之會矣”。他吟詩以誌：“珍重牛刀久護持，偶然小試得真師。高山流水知音少，白雪陽春屬和希。形隔何殊陵與穀，聲求已似鐵逢磁。扶輪賴有此遺老，翹首天南繫我思。”<sup>⑩</sup>他感謝給自己展示才華提供平臺的格致書院，感謝慧眼識珠的王韜。他還寫了一首《長歌》發表在《申報》上。這一年，殷之輅 50 歲。此後，他成為格致書院考課最為積極的參與者之一，共有二十多篇文章獲獎，得獎的名次從超等、特等到一等都有。1893 年秋季正課，他獲超等第一名，課卷在《申報》上發表，王韜特地在文後加按語：“殷君深悉洋務，精通算術，品學兼優，屢列超等，為人懇至樸誠有足多者”<sup>⑪</sup>。項藻馨也是一個例子。他是杭州人，7 次獲獎。他終生對王韜感恩戴德，一口一聲“弼師”。1894 年，他特地到上海看望王韜。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見到王韜。<sup>⑫</sup>如果沒有報刊，他與王韜是不可能有此師生緣分的。

書院課藝的內容，總體說來，可分兩大類，一是西學，二是洋務。就前者而言，課藝事實上成為那一時期的西學蓄水池，甲午戰爭以前的西學知識、變法思考，都彙集到這裡，此後的西學知識、變法思考，又多從這裡流出。具體地說，甲午以前，無論是通過傳教士的論著、報刊，出使人員的外國遊記，還是中國官辦翻譯機構如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民辦機構，包括傳教士所辦的機構如廣學會，他們翻譯的西書的內容，在這裡都有豐富的、具體的、經過消化以後的呈現與反映。甲午以後，各種經世文編、新學彙編，又多從這裡選錄資料，汲取營養，裒輯成冊。就後者而言，同光時期討論的各種現實問題，在這裡都有討論，舉凡開礦藏、修鐵路、興航運、辦銀行、通郵政、練海軍、強國防、改科舉、興學堂、開言路、設議院，在這裡都有相當豐富、具體的反映。其議題廣度、思想深度，都達到或超過了此前著名思想家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鄭觀應的《易言》中所表達的內容。<sup>⑬</sup>

格致書院是沒有圍牆的學校，書院考課是不定生員的課堂。其中西聯動的特點，使得書院思考問題、處理問題具有世界眼光，中國特色。考課策論是中國特色，課藝內容則具有全球視野。其官紳聯手的運作方式，是課藝得以開展的必要的政治保障、有力的經濟支撐與充沛的人才保證。南北洋大臣、口岸關道因其強烈的現實關懷、緊迫的當下意識，將造鐵路、辦銀行、改科舉、通民情等問題，一股腦兒捧到學生面前，讓那些來自天南地北的考生，不得不認真思考、切實面對，這就將他們從以背誦、理解詩云子曰為主的傳統課堂中驅趕出來，投身到救亡圖存的行列中。在這個意義上，格致書院就是培養西學與洋務人才的幹部學校。口岸官員通過這所學校，確實發現了一些洋務人才。鍾天緯因課藝傑出，被盛宣懷邀請到山東協助籌辦礦務學堂、試鑄錢幣與勘估礦產，還被張之洞邀請到漢陽幫助勘察礦產。楊毓輝因課藝出眾，被鄭觀應邀請協助編輯《盛世

危言》，多篇課藝論點被鄭觀應引用、轉錄。葉瀚、儲桂山、項藻馨等，日後都成為頗有影響的新學人才。葉瀚 1893 年任湖北自強學堂教員，後擔任《蒙學報》總撰述；儲桂山日後為南洋公學特班生，編有《新時務通考》（1902 年）、《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1903 年）等書；項藻馨主辦《杭州白話報》（1901～1904），任杭州安定學堂監督；許克勤擔任《蒙學報》撰述，瞿昂來出任中國駐英使館翻譯，陳漢章擔任北京大學教授。

就變法思想產生路徑、呈現方式而言，格致書院課藝面世以前，無論是魏源、徐繼畲的看世界、採西器，馮桂芬、王韜的變成法、採西學，都是思想家個人自發思考、孤獨生產、零星呈現的。通過格致書院課藝而表達的變法思想，則是有組織的、自覺的、整體性的批量呈現。口岸官員或鄭觀應、傅蘭雅等中西知識分子命題，讓來自全國各地（主要是口岸城市）的士子作文，就是讓這一看似無組織、實則有傾向的群體，自覺思考、共同生產以西學與洋務為關鍵詞的思想產品。同一議題，讓數十人乃至百餘人共同思考，得出數十份乃至百餘份答案，儘管從每一份看或許有偏頗，從多份看或許有雷同，但從整體看，則有著此前任何個人思想家都難以達到的深度與廣度。知識的匯聚，會增強知識的放大效應。思想的碰撞，會促使思想的發展與圓熟。此前思想家的產品，無論是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環志略》，還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鄭觀應的《易言》，其印數多不過千，少則數十、數百部，流傳範圍亦復有限，甚至主要是在少數至交中傳抄。而格致書院課藝，則先是逐年印刷發行、後是集中匯刻，其中挺拔卓異之篇，通過《申報》等報刊的轉載，更是化身千億，傳遍天下。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格致書院課藝在晚清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①“條約口岸知識分子”是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首創的概念，指生活在上海等早期通商口岸、與西方文化發生密切接觸且在中外文化關係的思考方面有所心得的中國士人，如李善蘭、華衡芳、管嗣復、蔣敦復、張福僖、沈毓桂、洪仁玕等，內以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為代表。何曉明：《略論晚清“條約口岸知識分子”》，鄭州：《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1 期。

②鴉片戰爭以後來華西人中，有些人專注於經商賺錢（包括販賣鴉片），有些人致力於外交，有些人醉心於傳教，也有些人在經商、外交、傳教等項活動的同時，研究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對中國的現狀進行評論與批評，乃至提出變革的意見或建議，諸如赫德作《局外旁觀論》（1865）、威妥瑪作《新議論略》（1866）、林樂知寫《中西關係略論》（1876）、花之安著《自西徂東》（1884）、李提摩太編《七國興學備要》（1889）。這些人身份不同，學養不同，所論著眼點不同，但從總體上說，都不出薩義德所說的東方主義窠臼，都以居高臨下的氣勢，以文明世界對野蠻世界的口吻，批評中國如何停滯、如何落後、如

何需要改革，但是，他們所評論所批評的內容，相當部分切中要害，比如生產方式落後、民生凋敝、教育僵化、男尊女卑、社會腐敗、政治專制等，這與口岸知識分子所論不謀而合，或殊途同歸。這些西人立論的參照背景，正是口岸知識分子歆慕的西方，因此，他們很容易成為口岸知識分子的同調。他們揭櫫的口號，為“醒華”與“興華”兩項。介紹世界歷史、地理、國際交往常識、各國教育概況、近代文明發展情況，是為“醒華”；提出眾多變法建議，概括的如教民、養民、安民、新民，具體的如興學、辦報、遊歷、採煤、冶金、興建鐵路、開辦銀行、改進稅收、獎勵工商、開設議院，是為“興華”。“醒華”與“興華”本不可分，但就時間而論，甲午以前所論，以“醒華”為多，甲午以後以“興華”為多。李提摩太編過《醒華博議》一書，所以，姑以“醒華派”概稱。

③關於上海格致書院的歷史與課藝的內容，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包括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志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熊月之《格致書院：科學之家》，為《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一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郝秉鍵、李志

軍《19世紀晚期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書院為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沈立平《〈格致書院課藝〉中的科學內容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劉明《格致書院課藝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④麥華陀（1822～1885），近代來華著名傳教士麥都思之子，出生於巴達維亞，青年時期在英國與澳門接受教育，1839年來華，旋入英國在華商務總監督與全權代表義律的秘書室，後成為英國侵華全權代表璞鼎查的隨員。1843年10月任英國駐滬領事館翻譯，1848年至1859年在廈門、香港、福州、杭州、漢口等地任職，1868年署英國駐滬領事，1871年起實任，1877年1月退休回國，同年被授予爵士。他精通中文，對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建設頗有影響。

⑤《宏文書院》，上海：《申報》，1873年3月25日。

⑥郝秉鍵、李志軍：《19世紀晚期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書院為例》，第21頁。

⑦李鴻章、李宗義的捐款，均係徐壽出面申請而得，經費分別出自津海關道洋藥加增捐款內與江海關道雜款項下。見《格致書院第一次記錄續印》，上海：《萬國公報》，1875年第358期。

⑧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夏鎮平、宋建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第110頁。

⑨王揚宗：《傅蘭雅與近代中國的科學啟蒙》，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74頁。

⑩《格致書院第一次記錄續印》，上海：《萬國公報》，1875年第358期。

⑪熊月之：《上海租界與文化融合》，上海：《學術月刊》，2002年第5期。

⑫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序言》，《格致書院課藝》（丙戌年），見上海圖書館編：《格致書院課藝》第一冊，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5頁。以下徵引此書，簡稱《格致書院課藝》。

⑬CHINESE PRIZE ESSAYS,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Jan. 25, 1888. 譯文見戴吉禮主編，周欣平、趙亞靜副主編，弘俠中文提示：《傅蘭雅檔案》（*The John Fryer Papers Volume Two Years in Shanghai Jiangnan Arsenal 1872-1896*）第二卷，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5頁。以下徵引此書，簡稱《傅蘭雅檔案》。

⑭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序言》，《格致書院課藝》（丙戌年），《格致書院課藝》，第一冊，第5頁。

⑮章程要點如下：（一）課題仿照策問體裁，“以洋務為主，旁及富國、強兵、製械、籌餉之類”；（二）考課分為四次，分別在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舉行；

（三）課題在《申報》等報紙上發佈，以六十日為限交卷，課卷均密封後寄至書院；（四）對於優秀的課卷“致送花紅”即給予獎勵，第一名送銀十兩，第二名送銀七兩，第三名送銀五兩，其餘獎額多寡，視卷數而定，大約每十卷取一；（五）課卷篇幅，課卷不可太過簡單，也不宜過分冗長，每題以三千字為率；

（六）應試者不論地域，不論身份，“無論已入仕途，或遠就幕府，以及舉、貢、生、監均可投考，本書院只論文字優劣，不問官階崇卑”，應試者可用真實姓名，也可以使用別名；（七）評閱人為“當代巨公或文壇名宿”，應試者不必向評閱人致送脩金；（八）優秀課卷將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格致書院擬以藝文考試章程》，上海：《申報》，1886年2月13日。

⑯1895年以後至1900年，由於時局動盪，加上傅蘭雅於1896年赴美，王韜生病（1897年去世），格致書院業務大受影響，考課時有中斷。1901年，潘慎文接任榮譽監院以後，謀求整頓，另訂新章，改革考課制度，分為師課與官課兩種。師課由書院教習出題，官課依然由蘇松太道、津海關道、寧紹台道、登萊青道以及南北洋大臣出題。

⑰《王韜致盛宣懷函》（光緒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以下簡稱“盛宣懷檔案”），第3362頁。

⑱王韜在信中稱：“格致書院夏季課題，望者眾矣，請即賜下，以慰士林”。《王韜致盛宣懷函》（光緒十四年七月十一日），盛宣懷檔案，第3385頁。

⑲對於1890年冬季的課題，王韜催了兩次。第一次函稱：“格致書院冬季課題應由閣下所命。敬求早賜一題，俾為多士矜式，藉切觀摩，不勝感泐”。《王韜致盛宣懷函》（光緒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盛宣懷檔案，第3410頁。過不多久，王韜再次催要：“格致書院冬季課題，敬請由閣下所命，以為多士矜式，倍加觀摩”。《王韜致盛宣懷函》（光緒十六年十月十三日），盛宣懷檔案，第3444頁。

⑳王韜在信中寫道：“六月曾肅寸楮，請命格致書院秋季課題，想公事旁午，故至今未蒙賜覆也”。《王韜致盛宣懷函》（光緒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盛宣



懷檔案，第 3502 頁。

- ②①《王韜致盛宣懷函》（光緒十三年，月日不詳），盛宣懷檔案，第 3389 頁。
- ②②《王韜致盛宣懷函》（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四日），盛宣懷檔案，第 3374 頁。
- ②③《王韜致盛宣懷函》（光緒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盛宣懷檔案，第 3362 頁。
- ②④劉含芳（1840～1898），字薌林，安徽貴池人，通曉法文，曾在准軍前敵營任事，後授二品銜直隸候補道員，在北洋沿海陸前敵營務處、天津海關供職。1892 年 5 月，調補山東登萊青兵備道，監督東海關，1893 年 11 月到任。
- ②⑤見《王韜致盛宣懷函》，（光緒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盛宣懷檔案，第 3502 頁。從現存史料看，劉含芳並沒有參與命題與閱卷事宜。
- ②⑥辛卯年秋季正課項藻馨卷，《格致書院課藝》第三冊，第 266 頁。
- ②⑦丁亥年春季正課葛道殷卷，《格致書院課藝》第一冊，第 175 頁。
- ②⑧課藝之出版、印刷單位，1886 年署“上海大文書局”，1887 年署“上海著易堂”，1888 年至 1893 年均署“弢園選印”，1894 年則署“格致書院選印”。
- ②⑨⑩⑪⑫⑬⑭《傅蘭雅檔案》第二卷，第 126 頁；第 131 頁；第 132 頁；第 134 頁；第 146 頁；第 151 頁。
- ②⑮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pril 14, 1893, pp. 513-514. 譯文見《傅蘭雅檔案》第二卷，第 148 頁。
- ②⑯由於傅蘭雅出面命題，不符合此前課考慣例，因此，《申報》在發佈傅蘭雅這兩次命題時，都特別說明原因，並強調傅蘭雅是“自沛廉泉，加惠儒林”。《格致書院冬季課題》，上海：《申報》，1890 年 1 月 13 日。
- ②⑰格致書院每次在《申報》上公佈獲獎名單，照例言明可到三馬路格致書室領獎、閱看評語。《辛卯年格致書院秋季特課出案》，上海：《申報》，1892 年 4 月 17 日。
- ②⑱上海、浙江、山東等地海關所在地，僅設一個道台，蘇松太道即江海關道、寧紹台道即浙海關道，登萊青道即東海關道，唯獨天津設了兩個道台，一是津海關道，一是天津道。參見譚春玲：《晚清津海關道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年，第 97～102 頁。因此，為上海格致書院命題，天津的兩個道台都會參加。

- ③⑨ 1894 年春季特課，李鴻章命題三道，題目已在報上刊出，但未見課卷出案，未見獲獎名單，亦未見優秀課卷刊出。1894 年秋季特課未見命題。估計與當時中日戰事影響有關。1895 年以後，特課命題恢復正常。
- ④⑩ 1889 年春，李鴻章覆格致書院中西董事，內稱：“據稟已悉，本大臣前擬每年特課上海格致書院一次，現經該董事等會議酌定，除四季課外，自光緒十五年春起，以二月初一日為本大臣開課之期，限兩月截止收卷，應准照辦。茲繕題目三道，封固隨批並發，仰即查收密存，屆時邀集各董公同啟閱傳示。在課諸生各抒所見，以現底蘊，不得倩人搶替，仍俟課卷匯齊，呈送核閱，評定甲乙，酌給獎賞，再行飭知”。見《格致書院特課題目三道》，上海：《申報》，1889 年 3 月 5 日。
- ④⑪《王韜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年二月二十二日），盛宣懷檔案，第 3528 頁。
- ④⑫這四位道台當時簡稱滬、津、東、甬四道。
- ④⑬參見譚春玲：《晚清津海關道研究》，第 72～77 頁。
- ④⑭李宗義（1818～1884），四川開縣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進士，歷任安徽英山、婺源、太平知縣。1853 年太平軍攻佔安慶，奉命赴廬州督運糧械。1858 年起，先後調赴曾國藩和湖北巡撫嚴樹森軍營。1864 年調赴兩江，負責江北厘金總局。次年署兩淮鹽運使，遷安徽按察使、江寧布政使。1869 年任山西巡撫，1873 年授兩江總督。
- ④⑮丁壽昌（1826～1880），安徽合肥人，字樂山。1853 年從安徽巡撫福濟鎮壓太平軍，以軍功升知縣。1862 年率偏師從李鴻章赴上海，與太平軍轉戰於蘇州、松江地區。後隨潘鼎新攻浙江，佔乍浦、嘉興。晉道員，加按察使銜。1867 年從劉銘傳鎮壓捻軍，又加布政使銜。劉銘傳病歸，他代統其軍。1869 年署天津道，後調赴天津總理營務，兼充海防翼長。1878 年署津海關道，補直隸按察使、布政使。格致書院創辦時，他捐款 300 兩，其數額在道台中僅次於上海道台馮煥光。
- ④⑯孫士達（？～1901），浙江會稽人，字竹堂。年幼喪父，讀書不成，投身軍隊，先後入曾國藩、李鴻章幕。1870 年，參與處理天津教案，以敏幹勤銳，見重於曾、李，被李鴻章留在身邊襄辦洋務，並經李推薦署理津海關道（譚春玲：《晚清津海關道研究》，第 82 頁）。格致書院創辦時，他捐款 200 兩。

④⑦吳育仁（1839～1898），安徽肥東人。1862年隨李鴻章入淮軍，參與鎮壓太平軍、捻軍，以軍功升至記名總兵，後調正定鎮總兵，授“施勇巴圖魯”勇號。此後成為李鴻章部下重要將領。格致書院創辦時，他捐款213兩。

④⑧沈保靖（1827～1903），字仲維，江蘇武進人，1858年舉人。早年隨李鴻章，後調曾國藩軍幕僚。1872年授江西廣饒九南道，1878年擢江西按察使，1881年擢升福建布政使。後奉命規劃江南製造局，又由李鴻章招赴北洋，辦天津機器廠，築津浦鐵路，建鑄幣局等事。1891年，以年衰退歸。格致書院創辦時，他捐款213兩。

④⑨盛宣懷（1844～1916），江蘇武進人，1870年入李鴻章幕，1873年在上海擔任輪船招商局會辦，1880年籌辦中國電報局，任總辦，1885年任輪船招商局督辦，1888年任山東登萊青道，1893年在上海籌辦華盛紡織總廠，任督辦。以後歷任淞滬鐵路總辦、會辦商約大臣、郵傳部大臣等。

⑤⑩王爾敏：《王韜生活的另一面——風流至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

⑤⑪《格致書院夏季課卷出案》，上海：《字林滬報》，1889年1月13日。

⑤⑫邵友濂（1841～1901），浙江餘姚人，1865年中舉，1874年補總理衙門漢章京。1875年出使俄羅斯，署理出使俄羅斯大臣，1882年任蘇松太道，1887年遷台灣布政使，1889年任湖南巡撫，1891年任台灣巡撫。他與李鴻章為姻親，李的侄女嫁給邵的兒子為妻。

⑤⑬龔照瑗（1835～1897），安徽合肥人。由監生報捐縣丞，1865年以軍功經李鴻章奏保為知縣，1875年捐升道員，在金陵辦理機器局、洋務局等事宜。1886年，任蘇松太道。1887年奉命重辦機器織布局。1891年遷浙江按察使，後任四川布政使、駐英法義比等國公使。1897年因病回國，在上海去世。

⑤⑭薛福成（1838～1894），江蘇無錫人。出身官宦家庭，1858年中秀才，1865年致書曾國藩，建議改革科舉、裁減綠營，學習西方軍事技術，深受曾賞識，遂入曾國藩幕。1879年作《籌洋芻議》一書，提出多方面變法主張，名重一時，被李鴻章延為幕僚，協理外交事務。1881年署直隸宣化府，1884年任浙江寧紹台道，1888年升湖南按察使，翌年任出使英法義比大臣。

⑤⑮周馥（1873～1921），安徽建德人。曾任李鴻章文牘，為李器重。1865年，經李鴻章奏保，以知府留

江蘇補用。1877年署永定河道。1881年署津海關道。1883年兼署天津兵備道。中法戰爭爆發後，奉命赴渤海口編練民船團練，協助李鴻章辦理洋務，後遷直隸按察使。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任職前敵營務處，馬關議和後，自請免職。1898年以後歷任四川布政使、山東巡撫、署兩江總督、兩廣總督等。

⑤⑯李正榮（1843～？），安徽合肥人，監生，李鴻章表弟，因參加鎮壓太平軍、捻軍，經李鴻章奏保，1868年以知縣留在湖北補用，後任職於山東海防營務處，1893年3月至1894年6月任登萊青道。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奏議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54頁；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山東省志》第五十二卷“海關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頁。

⑤⑰聶緝槩（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曾國藩女婿，1882年為上海機器製造局會辦，1890年任蘇松太道。1894年升任浙江按察使，官至江蘇、安徽、浙江巡撫。他對格致書院相當支持，命題5次，凡13道。其子聶雲台出任格致書院後期董事。

⑤⑱劉麒祥（1846～1897），字康侯，湖南湘鄉人，曾國藩姻親、陝西巡撫劉蓉之子，監生，早年隨曾紀澤出洋，任駐法國公使館參贊，1884年以候補道身份隨左宗棠在福建辦理洋務，1889年任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總辦，1894年經劉坤一、李鴻章奏保署理蘇松太道，翌年離去，1897年1月回任，同年逝於任上。

⑤⑲胡燏棻（1840～1906），字芸樞，安徽泗州人，祖籍浙江蕭山，同治進士，選庶起士。後補天津道，1891年任廣西按察使。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受命留駐天津辦理東徵糧台，旋奉命在天津小站練兵，以後歷任蘆津鐵路督辦、順天府尹、關內外鐵路會辦、刑部、禮部、郵傳部侍郎等。

⑤⑳《租界街道潔清說》，上海：《申報》，同治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⑤㉑干德利撰：《中國進步的標記》（R.S. Gundry, *Chin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895），張雁深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八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37頁。

⑤㉒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63頁。

⑤㉓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北平：《史料旬刊》，1931年第31～39期，第302頁。

⑤㉔《傅蘭雅檔案》第二卷，第142頁。1886年秋參加

人數，見《格致書院秋季課卷出案》，上海：《申報》，1887年3月11日。

⑤⑥⑦⑧劉明：《格致書院課藝研究》，第26頁；第37～38頁；第87頁。

⑨1889年秋季特課中，沈毓桂寫的《鑄銀幣得失說》、《聖人有四府論》兩篇文章，均獲得超等第九名；1889年秋季正課，他獲得特等第十名；1889年冬季正課，他獲得一等第十五名；1891年春季正課，他獲得一等第二十二名。

⑩《申報》發表錢志澄課藝，王韜在文末附識中稱錢志澄“年僅屆冠”。見《北邊防務輕重緩急何在論》，上海：《申報》，1889年10月1日，第1版。

⑪《格致書院春季課題》，上海：《申報》，1886年4月16日。

⑫《格致書院春季課題》，上海：《字林滬報》，1886年4月16日。

⑬李秋（1840～1911），字問漁，江蘇南匯（今屬上海）人，畢業於天主教學校徐匯公學，1862年入耶穌會，1872年升任神父。他精通法文、拉丁文，曾任震旦學院院長，有《西學關鍵》、《哲學提綱》等多種關於西學的著作與譯作。

⑭錢昕伯（1832～？），名徵，浙江吳興人，王韜女婿。《申報》創刊時，曾受美查委託赴香港考察報業，其時王韜正在香港籌辦《循環日報》。錢主持《申報》編輯部二十餘年，對《申報》言論和新聞報導的改進頗有貢獻，很受美查信任。

⑮何桂笙（1841～1894），名鏞，浙江紹興人，1884年前後入《申報》，與錢昕伯一道擔任總編輯蔣芷湘的助手。蔣芷湘1884年考中進士後離開《申報》，錢昕伯繼任總編纂，何桂笙擔任錢的助手，為撰寫評論文章之高手。

⑯黃協塤（1851～1924），字式權，江蘇南匯人，秀才出身，1884年進《申報》館，在申報館主持筆政工作20多年，直到1905年《申報》大改組後離開。

⑰袁祖志（1827～1898），字翔甫，浙江杭州人，清代大詩人袁枚之孫，自己也捐過縣令一類的官職。1876年，受上海道台委託主持《新報》。1883年隨招商局總辦唐廷樞遊歷西歐，歸國後著《談瀛錄》、《出洋須知》等書。《新聞報》創辦，聘其為編纂部主任。1896年以年邁辭去總編纂職務。

⑱蔡爾康（1852～1921？），江蘇嘉定人。秀才出身。1876年進入《申報》館，主編《申報》館出版的通俗

報紙《民報》，之後又參加報館出版的《寰瀛畫報》的文字說明、編輯工作。1883年任《字林滬報》主筆，1891年辭去此職。1893年曾參與《新聞報》筹建，並任主筆，僅五個月，因與董事會意見不和，退出報館。1894年，接替沈毓桂任《萬國公報》華文主筆。1901年後任廣學會翻譯。

⑲高太癡（1863～1920），江蘇蘇州人，秀才出身，是何桂笙學生，經何介紹，入申報館任助理編輯，1890年離開《申報》，以賣字畫為生，後一度擔任《字林滬報》主筆。

⑳《格致書院秋季課題》，上海：《申報》，1888年10月3日。

㉑《格致書院夏季課題》，上海：《申報》，1889年5月24日；亦見上海：《字林滬報》，1889年5月24日。

㉒《格致書院夏季課題》，上海：《新聞報》，1893年6月6日。

㉓這類文字很可能出於王韜手筆。對照《申報》、《字林滬報》與《新聞報》，有時候在相同題目下，附加的文字完全一樣。有些信息，如上面引文中所謂“且觀察有云，此題非精心考核，似難著筆”，非知情人不可能作此論斷。

㉔這段文字是：“此篇為烏程錢志澄所作，應格致書院戊子冬季課試，天津兵備道胡芸楮觀察拔取超等第一。志澄一字孟勤，年僅屆冠，而其才氣縱橫渾灑已如此，頗有蘇家策論風，誠當今未易才也。充其養，精其識，何難於古文名家中別樹一幟哉！天南遁史王韜附識”。上海：《申報》，1889年10月1日。

㉕《潮汐應月說》，上海：《申報》，1892年4月28日。

㉖《物體凝流二質論》，上海：《申報》，1892年4月24日。

㉗《續論採煉鋼鐵織紡紗布》，上海：《申報》，1893年8月1日。

㉘王韜在識語中稱：“今按卷中所陳十四條，亦自有見，惟間有不能行者，如通運道頗非易事，大冶至漢陽，中隔一江，過江方通旱道，並非通衢，且徑路有甚為狹窄之處，開擴殊費工程；設公司於外埠，徵稅輕重，權自彼操，勢必使我多方掣肘，我之產鐵雖饒，而洋鐵近猶充物欲，將中鐵推及外洋，不免徒託空言。至於欲更稅則，談何容易？稅則載在條約，驟議加重，西人必不允行；收種洋棉，亦屬變通盡利，然當辨土性相宜，方能布種。煤鐵二項，必兩相資，煉鐵首在求煤，移鐵就煤不如移煤就鐵，必相近乃可省

運費，卷中尚未講及。然思精慮遠，擘畫周詳，其才洵不可及也”。《續論採煉鋼鐵織紗布》，上海：《申報》，1893年8月1日。

⑧殷之輅：《格致書院丙戌秋課案出忝列超等之末詩以紀之並序》，上海：《申報》，1887年6月21日。

⑨《問演故槍炮測量遠近度數》，上海：《申報》，1893年6月19日。

⑩項藻馨：《項蘭生自定年譜》，載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檔案史料研究》，第9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

⑪對於《格致書院課藝》的具體內容，前面注釋已經述及的王爾敏、郝秉鍵、沈立平、劉明的著作與論文，已有相當細緻的研究，這裡不再展開。

**作者簡介：**熊月之，江蘇淮陰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史林》雜誌主編、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上海市文史館館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孫中山研究會會長、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組專家、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1972～1977年在上海警備區當兵，其間曾入復旦大學，師事陳旭麓、姜義華等教授，勉力注釋章太炎著作，得以與歷史學結緣。恢復高考後，先考入蘇州大學歷史系，為1977級，半年後再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班，1981年獲碩士學位，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歷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1993～2002）、所長（2002～2012）、副院長（2004～2012）。曾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及伯克利分校、英國牛津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哥廷根大學、埃爾朗根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做訪問研究。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與上海史研究，著有《章太炎》、《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向專制主義告別》、《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通史·總論》卷、《馮桂芬評傳》、《異質文化交織下的上海都市生活》、《萬川集》、《千江集》；主編《上海通史》、“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中華大典》歷史典、《外語文獻中的上海（1843～1949）》、《辭海·中國近代史分冊》、《晚清新學書目提要》、《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西制東漸》、《西風東漸》等。

[責任編輯 劉澤生]